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回忆录卷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3576138

K263.4
16
2

長征日記

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

赵 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B 692282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开 51 印张 1200 千字

1990年10月北京第 1 版 1990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500

ISBN 7-80023-154-2/K·217

定价：29 元（三卷）

目 录

-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李维汉 (1)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马文瑞 (103)
- 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刘景范 (129)
- 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劲旅.....肖劲光 (167)
- 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
-耿飏 贺晋年 (182)
- 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王思茂 (202)
- 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李易方 姬也力 (211)
- 回忆陕甘宁边区光华农场.....陈凌风 达时 (221)
-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李强 (231)
-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沈鸿 (236)
- 回顾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建设.....黄静波 (245)
- 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工作.....喻杰 (258)
- 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王政新 (270)
- 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工作.....郑戈桓 (285)
- 西北党校和中央党校五部整风的历史回顾.....白栋材 (298)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李之钦 (313)
- 党的光辉指引我们前进.....鲁之俊 (340)
- 记我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七年
- 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田方 (348)
-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回顾.....	苏一平 艾克思	(357)
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的历程.....	张季纯	(384)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	李维汉	(405)
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	郝占元	(42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	白向银	(438)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	白 茜	(450)
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金 城	(470)
回忆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时的优良作风	吴良珂	(485)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		(500)
后 记.....		(594)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

李 维 汉

(一)毛泽东的嘱咐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但存在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国民党顽固派方面，他们把陕甘宁边区看作眼中钉，时刻妄图拔掉它。一九四〇年前，尚有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和电报局、邮政局等通讯机关设在边区，还设有榆林地方部队常驻机关，从事反共反边区间谍破坏工作。这些机关因其破坏活动被我揭露撤离后，国民党又不断向边区秘密派遣特务，并在洛川、西峰镇、榆林三处设立反共据点，伺机进袭，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封锁边区。二是我们自己方面，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化闭塞，人畜死亡率很高。全区共辖二十七个县、市，包括陕西、甘肃、宁夏的延安（县、市）、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定（子长）、安塞、保安（志丹）、固临、绥德、清涧、米脂、佳县、吴堡、新宁（宁县）、新正（正宁）、赤水（旬邑）、淳耀（淳化、耀县各一部分）、庆阳、合水、环县、华池、靖边、定边、盐池、吴旗等地。人口仅一百五十万。因此，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学习告一段落，确定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时，枣园打来一个电话，说毛泽东找我谈话。我到了毛

• 本文原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四月）。文内的注释是原有的。本书编者对个别史实、时间、人名、数字有订正。

泽东那里，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主要谈边区政府的工作。他说：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他知道边区已经有火柴、毛织等工业和七百个工人，沈鸿还带进一些机器来，很高兴）；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

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到职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离开，我在边区政府一共工作了三年零七个月。我的职务是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景林是副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秘书长，以后常黎夫来了，他先是秘书处长，以后是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主要协助以林伯渠为首的党组做一些会议组织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就使我有可能会花更多的力量去做上述的工作，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在协助组织大会和研究政策工作中，经常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总结经验，也付出了辛勤劳动。这几年边区政府的工作安排及其方针政策，就是根据毛泽东的上述原则要求和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进行的。

政府工作的面很广，这里着重回忆毛泽东嘱咐的四个方面工作，即：精兵简政，政权建设，经济工作，文教工作，另外再谈谈土地改革、接待中外记者团和一个政治运动：审干和“抢救”。

(二)精兵简政

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我在同年同月临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他找我谈话嘱咐我转达边区政府的第一件事，也是精兵简政。我回忆在边区政府的工作，就从精兵简政开始。

一、严重困难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是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空前物质困难的时期，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支由于下列三个原因，也发生了很大问题：第一，脱产人员猛增。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仅一万六千人。一九三九年后，主要是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一九三九年起直线上升，计：一九三九年四万九千人，一九四〇年六万一千人，一九四一年七万三千人。人员猛增，支出随之大幅度增长。第二，财政收入锐减。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存在一个很大弱点，就是依赖外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

援所占的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五十一·六，一九三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五·七九，一九四〇年为百分之七十四·七。一九四〇年十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第三，人民负担加重。中央曾经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但当时实际已达百分之五·四，势必增加人民负担。以人民的公粮负担为例：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万石，一九四〇年十万石，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这个二十万石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八，比一九三七年只占百分之一·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它说明每人平均负担已达一斗四升，比一九三七年只负担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人民负担确实重了，党内外反应强烈，党中央、西北局极为关怀。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一月，西北局曾派宣传部长李卓然率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在固临县调查了三个区，写了一个《固临调查》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正是由于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就使我们的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困难，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二、采用建议

精兵简政，是李鼎铭等人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二月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个提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向各抗日根据

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普遍推行。以后毛泽东还说过，“‘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三、第一、第二次精简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执行第二届参议会关于精兵简政的“速办”决议，在参议会闭会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就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同年十二月中旬就拟定了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三个月后，至一九四二年四月，整编工作基本结束，裁减了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了工作人员数千名，这是收获。但由于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的必要性的认识也不足，所以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开始了第二次精简。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如实行合署办公制度；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使领导人有可能多抓政务；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等。边区政府各个单位根据这一重点分别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改革制度。八月初实行合署办公。这次精简工作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不多。

四、第三次精简

一九四二年九月，第二次精简已经结束，正在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的准备工作。我参加了第三次精简。

1.准备工作。第三次精简酝酿很久，准备充分。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总结经验。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对前两次精简进行

了认真的检查，内容包括：经过精简后，机构设置是否合适，人员配备有无余缺，职责分工是否明确，行政、用人和总务工作有无制度、是否完整，干部使用、领导作风、目前工作存在什么问题等。这次检查实际是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动员第三次精简工作。我虽然未曾参加第一、二次精简工作，但从这一检查中大体了解了它们的成绩、经验和问题，为参加第三次精简工作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统一认识。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我们专门召集分区专员，延安、安塞、甘泉等县县长，以及其他一部分县、区、乡干部，举行简政座谈会，研究专员公署^①以下各级政府的简政问题。这次座谈会以整风精神进行讨论，使大家对于各级政府的职能有了一致的认识，普遍认为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关键在于加强乡政权，简政工作必须以加强乡政权为重点。通过这次座谈会，明确了第三次精简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为深入进行精简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准备文件。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西北局召开高干会，简政整政问题是重点讨论问题之一。根据政府党组的指示，在多次集体酝酿的基础上，我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和林伯渠准备在高干会上作的关于《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林伯渠在高干会上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并把《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交大会讨论，获得通过。

第四，听取指示。准备工作的最重要一步，是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也提出了“精兵简政”工作。他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

^① 陕甘宁边区的政制为边区、县、乡三级。专员公署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编者注

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是对过去精简工作的批评，也是对今后精简工作的期望。我直接听到了这些指示，极大地提高了对精简工作的意义、目的和要求的认识，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武装。

2. 贯彻执行。第一、第二次的精兵简政只在政府系统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根据毛泽东提出必须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的要求，在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和军队系统也进行了。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精兵简政，对中央机构的人员也进行了精简，为延安其他党政军机关的精简工作，做出了榜样。

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第三次精简工作的基本纲领，就是《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它经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明令公布，下达执行。其主要内容和贯彻执行情况如下：

第一，主要内容。这个《纲要》根据边区整风中揭露的问题和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从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十一个问题。其中主要是：一、指出了这次精兵简政的目的，是要使政权工作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要减去一些不急需的机构和人员，把政府系统人员由现有的一万一千五百人减至七千五百人，即减去百分之三十五弱。二、重新划分和审定边区政府及其各个工作部门、各分区代表机关、各县、乡政权机关的职权和业务。规定“边区政府是边区政权的首脑部”，基本任务是“掌握政策，掌握干部”；“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基本任务是“组织人民经济和健全乡政权”；“乡政权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发

展农村生产”。三、要求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要善于掌握政策，即会出主意，会指导实行。《纲要》强调指出：“这次简政工作涉及了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以及拥军问题，三三制问题等等”，就是说，“简政工作是一序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序列的思想问题”，“必须从组织上贯彻，又从思想上贯彻”。因之，一方面，要同整风学习结合，用整风精神进行简政；又一方面，要同检查工作结合，政务人员要作思想检查，政府系统要作工作检查，用思想指导行动，用行动贯彻思想。要求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完成这次精简任务。

第二，组织实施。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组织工作，首先是一项十分细致的思想工作。工作人员担心列入编外，不光荣；领导人员担心减少人，难办事。思想问题一大堆。因此决定召开一些干部会议，我和民政厅长刘景范一道，先是召开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负责人会议，做领导机关的思想工作；再是召开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做中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在这些会议中，先组织学习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讨论《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研究实施简政的措施和加强生产、教育工作的途径。经过这样的学习、讨论和研究，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决心和信心也就大了。

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组织措施和条例，如《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乡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约》、《简编方案》等，为简政规定了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

这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又做了一些组织工作。

第三，效果。第三次简政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到一九四四年初检查，已经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即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

精简。业务上，做到了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具体情况将在本篇的《自力更生，建设边区》和《文化教育》两章介绍）。边区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一般已能抓住业务中心，开展业务工作。机构上，全部按简编方案执行。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减了四分之一，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从八、九个减至四、五个等，消除了头重脚轻的积弊。人员上，边府各厅处院及县附属机关的人员，都已按计划精简，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等六个单位从原有四百六十九人减至二百七十九人，精简百分之四十强。干部调配上，从下级提拔了一部分干部到专署和边府工作，如边府就调入了五个县长当处长。也选派了一些得力干部去加强区乡政权，如延安县就有十个县级干部调区，二十个区级干部调乡，选送一百五十多个高、中级干部去干部学校培养提高。初步实现了精简上级，加强下级和生产单位的方针。

统一。政治上，政策、法令、命令、指示已基本统一，“政出多门”的现象少了。组织上，加强了“一元化”。各厅、处、院、局在具体业务上可与下级相应业务机构直接联系，重大任务的部署则一律通过各专署、县政府负责人进行。人事任免上，基本上已统一于民政机构，改正了各自为政、自由任免的现象。

效能。由于坚持了统一领导，反对了“各自为政”的现象，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加强了下级，使工作效能有很大提高。尤其一些行政和企业机构，工作有明确指标，效能的提高更为显著，如文书科三个人做了过去十三个人的工作。边区通讯站一至四月每日平均投递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五至十一月激增至每日平均投递三万零七十八件，提高效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政府经营的工业中，效能提高的程度更为惊人。

节约。民力的动员减少了，如延安一九四一年动员民力六万多个，一九四二年只动员二万八千多个，减少一倍多。绥德一九

四一年动员民力七万五千多个，一九四二年只九百个，简直说不上什么比例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自力更生，自运粮草，不再动员民力，这样就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学校节约粮食、燃料、日用品的成绩也很突出。三五九旅用洋芋和南瓜部分代替粮食，做到了粮食全部自给。被服厂、纺织厂、振华造纸厂等工厂由于精打细算，节省了大量布匹、棉纱、木材等生产用原材料，对经济建设贡献很大。

反对官僚主义。在过去一年中，在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上，也有进步。我们许多领导干部为贯彻《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在精简机构和人员、建立统一领导的制度和纪律、调整干部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如一九四二年工厂会议开得好，转变了对工业的领导；具体帮助农业劳动英雄订一年生产计划，对边区按户计划及生产竞赛起了号召和推动作用；边区政府对于专员公署的日常指导，也减少了命令方式，增加了民主协商。边区政府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作风，也有改进，主要表现在对生产的领导具体了，大家能够自己动手去组织变工队、订农户计划、修水利、组织运输队、改造二流子、改造合作社、改良植棉等。总之，从上到下“官僚”少了，人民勤务员多了。这是最得人心的转变。

从以上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次精简工作是有成绩的。说明从边区政府到各专署、县、乡政权确实做到了从思想上贯彻，从组织上贯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是做得很好的。

3. 第三次精简工作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有不足，也有过头。这是指第三次精简工作本身说的。有不足，如家属等未妥善处理，使不属正式编制而继续吃公粮的，仅边区一级还有一千余人。浪费现象也还比较严重。也有过头，即有过分集中的倾向，如对小学，部分地采取合并的办法，助长了不适合农村环境的“集中办小学”的缺点，对社会教育也如此，强调社会教育集中办，有的一个区才办一个冬学。机械地执

行政府系统新定七千五百人的编制，削弱了某些必要的正常的业务活动。

第二，走回头路。精简后好了一阵，随后又恢复了老样子。这是指第三次精简工作过后的变化说的。第三次精简工作以后，有些单位在组织、机构、制度、人员、作风等各个方面，始终坚持精简成果，甚至续有提高。但也有些单位时过境迁，又走回头路，比如，机构又有增设，人员又有膨胀，制度又有废弛，统一又有削弱，效能又有下降，浪费又有抬头。尤其严重的是，在领导作风方面，官僚主义的残余显然大量存在，并有滋长趋势。

五、经 验

经过三次精简，至少获得三条经验。

1. 只有精兵简政，才能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任务。当时的急要和首要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教育。由于多次进行精简，才终于集中力量发展了生产和加强了教育。可见，凡事要有中心，工作要分缓急。如果缓急不分，百端俱举，必然急也变缓，一事无成，一端也举不起来。

2. 精兵简政是临时工作，又是经常工作。所谓临时工作，就是按照一定的精简计划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有时间性。所谓经常工作，就是要把精简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始终，无时间性。我们必须不使一次精简后，时过境迁，死灰复燃。如果一次精简后就一曝十寒，肯定会把精简成果丧失殆尽的。过去的精简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全国解放后的多次精简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3. 精兵简政是组织工作，又是思想工作。要改革体制、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健全制度等，一句话，要在组织上贯彻，首先要在思想上贯彻。要做好思想工作，打通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引导人们不是被动应付，而是自觉执行。如果组织工作没有思想工作做保证，组织工作就会失去灵魂，不能持久，也无

法巩固。

(三)审干和“抢救”

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运动，但已近尾声。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根据西北局决定，我组织总结了这一运动，大体上没有毛病，从略。这里着重谈审干和“抢救”。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夸大敌情，批判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并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此后不久，边区政府就有少数单位(如边区银行等)开始审干。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政府保安处开始逮捕所谓“特务”、“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四月三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整风的目标除“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四月中旬全面展开的。

一、“之”字路

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都是由边区政府系统总学习委员会领导的。总学委的负责人是林伯渠、谢觉哉，我是总学委委员，主持日常工作，实际负主要责任。运动的安排同延安地区总的步调基本一致。我个人参加领导这一运动走了一段“之”字路：谨慎——急躁——复谨慎。最初是谨慎的，我知道苏区搞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在最后一次“抢救”大会后，才又恢复理智，退了下来。

我走“之”字路的大致情况如下：

1. 比较谨慎。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全面展开审干工作至五月二十二日在边府大礼堂召开坦白大会，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